

第六章、結論

第一節、中西市民社會理論的比較

我們將中西市民社會理論的發展作一比較，簡言之，若硬性的將現代市民社會的出現，界定為資本主義的發展所致，而將以私有產權為核心的新興資產階級作為市民社會的基礎，在研究上就難免有本質化的弊病，忽略了非西方地區在客觀環境的限制，故重點應放在：

1. 社會上有無實體仲介層或第二社會的出現，它的範圍是地方還是涵蓋全國；
2. 研究客體如何在自身的政治文化上，尋求國家與社會基層間的聯繫網絡；
3. 市民社會對政治性議題的討論有無一多元、公開、自由的空間，它的容許度多高；
4. 這個國家的市民社會在探討的過程中，能否強化成員對其的認同感，並建立一有效的反饋機制。

上述四點回答了本文的第一個研究目的。在第一點我們探討了宗族士紳的權力文化網絡、新興民間組織與村委選舉等，經改讓社會階層起了變化，因此傳統的文化網絡與黨國體制重新結合，這使得國家在縱向連繫上雖仍維繫了對社會基層的滲透，但在橫向整合上卻因各種民間網絡而被區隔，使得實體仲介層的影響層面多集中在地方領域。

第二點則延續第一點的思考，中共並不因經改的實施而放鬆對社會的掌握，傳統家國觀念與列寧黨國體制的結合，使得大陸社會很難能如西方一般與國家相對立，因此民主集中制的實施與市民社會的發展，都強調共黨在其中的引導作用，故如何擴大黨的利益涵蓋，降低對意識型態的堅持，就成為中共努力的目標。

第三點在知識份子與傳媒的討論中，可發現雖然言論空間已較經改前寬廣，但不挑戰共黨執政的立場仍是其公域討論的底限，前者在六四之後以民族國家的富強為範圍，後者雖開放經營權，但在傳播內容上卻依然嚴格把關，這使得市民社會中言論的多元化，其程度還不如民初公共領域的發展。

最後一點總結了以上各點的共通處，為何黨國力量在經改後依然強大。原先的黨組織在受到衝擊以後，勢必得尋找其他方法重塑對社會的

掌控，因此對市民社會的引導，一方面能在過程中深入各種新興階層與利益的發展，一方面也可進行黨內體制的轉型，將實體仲介層的影響轉化成黨內的反饋機制。

誠然，這種理論適用上的轉換，仍不脫東方化的思辯質疑，但在立論上卻已經過了揚棄的階段，在全球化的時代，若要再硬性區分何謂該國的特殊處，並刻意強調理論適用上的精準無誤，反又陷入本質化的譏諷中。我們利用西方的市民社會理論，並非認為中國應走西方的道路，而是在文化互為滲透的情況下，市民社會理論有助於觀察社會自主力量以及上述論點的發展。

是故，在國家社會關係中，能否有一不受國家力量支配的領域就成為吾人切入的焦點。傳統中國仰賴儒家與宗法制度，使國家僅需維持一人數極少的官僚系統，就可控制整個帝國的運作，因此士紳與宗法制度可說是當時中國的實體仲介層，尤其當清末這些人搭上土洋買賣的順風車後，更將其觸角深入了現代商業，可以說，當時中國在家國不分的前提下雖不存在市民社會，但實體仲介層的出現確實具備了市民社會的肇端。然而隨後因軍閥的割據乃至中共政權的建立，這股政治自主力量受到了官僚的滲透，使得仲介層完全由龐大的黨國官僚機構掌控，直到經改開始才又出現新的社會階層。

而在公共領域的部份，我們也不照搬哈伯瑪斯的想法，只要有一政治性議題的討論空間，能排除公權力的直接干涉，就認應有公共領域的出現。就羅威廉、黃宗智等人的看法，傳統中國社會已有公共領域或第三領域的出現，然而這些公共領域並未真的形成一以國家政治事務為議論範圍的空間，他們關切的多為地方議題，因此這些公共領域只能說是宗族公共領域或地方公共領域等，以國家為範圍的公共領域一直要到清末至民國年間，才在知識份子的鼓動下短暫建立。同樣的，這個契機在中共建政以後受到摧毀，經改以後公共領域的發展在傳媒開放和知識份子地位提升後，確實重新復甦，然而對政治議題的敏感與對民主集中制的堅持，使得公共領域的發展仍需在國家允許的範圍內進行，在空間上較實體仲介層的發展狹窄許多。

最後在認同部份，市民社會對西方來說扮演著國家認同的建構基礎，就國家來說，能否有效滿足市民社會的期許，不壓抑市民社會的自

主空間，是國家合法與運作的先決機制。因此相對於國家，市民社會彷彿成為一先驗、善良的存在，但對中國來說，市民社會是在中國學習現代化的過程中，用以檢證自己是否進步的參考點，因此市民社會反成為被形塑的對象，這使得市民社會理論的研究一直無法擺脫被扭曲的命運，即便進入經改，市民社會更成為重塑認同的管道，在追求的同時無法擺脫工具化的意涵。

中西市民社會理論的比較植根於政治文化的差異，原先在中國傳統的文化網絡，已建立了包括實體仲介層的市民社會因數，然而這個因數先在民國初年因地方的割據而淪為財政剝削的一環，繼之在列寧黨國體制的滲透下而消逝，使得中國市民社會的發展在進入民國以後就逐漸萎縮¹，而它更深層的動機，則是既有文化網絡在西方勢力的入侵下崩解，市民社會反成為一認同尋求的工具，故發展到後來不管經過多少努力，市民社會已擺脫不了國家力量的滲透。

表 6-1 中西市民社會理論的比較

	判別標準	西方市民社會理論的觀察角度	大陸市民社會理論的觀察角度
國家與社會關係	1. 有無實體仲介層或第二社會的出現 2. 研究客體如何在自身的政治文化上，尋求國家與社會基層間的聯繫網絡	1. 市民社會與政治社會間的區別（古典時期至洛克的市民社會理論） 2. 資本主義的發展與資產階級市民社會的出現（黑格爾與馬克思的市民社會理論）	1. 傳統中國在傳統儒家與宗法、道統下的文化網絡（士紳知識份子所組成的仲介階層） 2. 中共建政前後黨國力量的滲透（城市的單位社會主義、農村的合作社經濟） 3. 經改以後社

¹ 杜贊奇(Prasenjit Duara)、王憲明譯，從民族國家拯救歷史，第3章。

		3. 晚期資本主義時期中官僚與科技的結合, 如何使國家與市民社會出現互為滲透的情形(二元論與三元論)	會自主立量的發展(單位制的解體與農村經濟的新型態、黨國力量如何重塑對基層的滲透)
公共領域	1. 對政治性議題的討論有無一多元、公開、自由的空間, 它的容許度多高	1. 公共領域與市民社會的關係 2. 資產階級公共領域以及啟蒙理性的發揚(哈氏的公共領域的模型) 3. 晚期資本主義的生活世界再封建化(科技與官僚如何侵入公共領域)	1. 對傳統中國公共領域的爭辯, 以及晚清知識份子的公共議論空間 2. 中共建政後的公共領域發展(產權的多元化、社會仲介層的參與、知識份子的處境、傳媒的發展)
認同	1. 市民社會在探討的過程中, 能否強化成員對其的認同感, 並建立一有效的反饋機制	1. 認同的建立與文化霸權的分析 2. 市民社會如何強化國家認同的形成	1. 傳統中國的認同(立國的儒家與宗法制) 2. 由上至下對新認同的尋求(立國根基與富國強兵的衝突) 3. 經改後的認

			同建立（由黨國組織與意識型態的結合，到國家引導的市民社會）
--	--	--	-------------------------------

第二節、網際網路對大陸市民社會理論的影響

在對網際網路的討論上，重點集中在網絡連結的概念。與人類社會習慣的層級組織不同，網絡是一種扁平化的連結，它既不能以組織稱之，也很難稱它有什麼結構。在思考上，網路並不能取代人際交談，它不過是一種互動的介面，溝通的還是人類，但在實際的效用上，卻加大了溝通的領域，使得既有的時空概念流動化，因此網路的掌握，反而拉大了資訊貧乏與充足者間的差距。

故在適用上，網際網路就已顛覆了建構大陸市民社會所仰賴的層級結構。照說網路的使用在內可打破國家對社會自主力量的限制，在外則可連結全球市民社會的影響力，使大陸的市民社會因與全球作連結而增加共黨在政改上的力度，然而實際上，這種發展忽略了網路邏輯與現實社會的差異。離線身分主要受限於現實社會的層級結構，它要求權力關係的明確與連繫脈絡的可依循；但線上身分雖受到了離線身分的投射，卻可以虛幻、假想的自我形象做溝通，它的溝通也非層級結構，而是跳躍的節點互動，因此將網際網路發展視為大陸市民社會自主性的新場域，顯然就只顧及線上身分對離線的連結，忽略了線上的虛幻處，這就回答了本文的第二個研究目的，

表 6-2 網際網路對大陸市民社會理論的影響

	大陸市民社會理論	網際網路的影響
國家與社會關係	層級組織連結、國家與市民社會的相對等	網絡連結 社會的扁平化、溢出國界的限制
公共領域	社會自主力量的提昇與公共議論空間的擴大	社群化削弱公意與理性的尋求、跨國議題的連結

認同	正當性認同的建立	社區認同的取代
----	----------	---------

在國家與社會關係上，網際網路一方面使社會朝扁平化發展，削弱了國家對社會的控制範圍²，一方面也讓社會因此形成各種以議題為取向的區塊，所以連結的同時反使社會的自主力量不再與國家相對立，而成為一無視於國界的行為者。市民社會這幾年受到中共官方和學界的重視，主要是因經改鬆動了黨國對基層的滲透，故如何在社會自主力量發展的同時重建連結，就成為中共維繫統治的指標，網絡型態有利於社會自主力量，但網絡連結卻不利於共黨嚴密的層級組織，直接挑戰了國家權威。相較於宗族等傳統網絡，網際網路所造成的區塊更無視於國界的範圍，宗族間與對國家的互動，基本上仍以相同文化為底，因此在溝通的同時，並不會顛覆對國家、文化的認同，但網際網路首先在科技的運用上就已區隔了內國人民的思考時空，而它的互動又以使用者個人的身份進行，加速了社會原子化的發展。

而在公共領域的探討上，網路似乎提供了多元互動的公開領域，這對政治性議題受限的大陸社會來說，確實增加了一新的溝通空間，然而社群現象的出現，使得網路上的交談一方面充滿偏激的言論，一方面形成了各種互有隸屬的社群，在意見的交流上，不僅難以求取一理性、公意的存在，所謂的言論公域，也因此成為跨國議題的整合。對使用者來說，進行議題的討論間接落實了干涉他國內政的口實，當使用者援引網路公域的意見向內國政府提出要求時，滿足的是該社群的期待，而非該國公域的意見凝結。

最後在認同的形塑上，網路的社區認同取代了市民社會的正當性認同。對後者來說，市民社會不管是中國大陸或西方社會，它在國家認同的確立上，確實伴隨著民族國家的體系，即便隨後因歷史的發展而出現了定義上的變遷，市民社會終究是國家認同的基礎，網路與之前的轉變不同，使用者雖不能排除現實社會上國籍認同與自身文化的束縛，但在流動的情況下交談卻使得虛擬空間扭轉了現實認同的基礎，一個滿腦子外國的使用者，他最初所稟持的中國認同，在往後還能維持不變嗎？他與內地缺乏網路使用的人來比，兩者對中國的認同與界定又如何比較

² 王水雄，結構博弈 - 互聯網導致社會扁平化的剖析（北京：華夏，2003年），第8章。

呢？網際網路對政治學的衝擊就在於它超越了國家觀念，在尚未有全球政府出現之前，政治學必須學習如何消化各種遊移的網路使用者。

故所謂的中國、民族、固有文化等意識建構，在全球化的今天早已因網際網路的發展而呈多元變動的格局，概念既是形塑而成，自可再次形塑，重點是對習慣有根的個人來說，網路提供的多重選擇，讓人們因此感到焦慮。對認同的解構，實際上也說明瞭現實社會中的市民社會在虛擬空間的網絡邏輯下，終將受到取代的命運。這並非認為虛擬空間戰勝了現實社會的邏輯，而是虛擬與現實的互動下，以無法利用市民社會與主權國家的角度來詮釋人類社會。

本文研究的雖是大陸市民社會理論，但論述所及，也包含了對市民社會理論的看法，這是文中的第三個研究目的，然而在研究的過程中，吾人發現很難對此一問題提出武斷性的立場，就一發展潛力尚未明確的網絡社會，任何肯定式的語氣都只是一不負責任的單方面思維，吾人僅希望在客觀事實的前提下，就網際網路對社會的影響提出一較務實性的描述，而非一未來學的架構。換言之，本文並非遽以認為大陸市民社會在網際網路下無法得到發展，由之前的討論可發現，網路確實有自己的邏輯，但這種邏輯有時對市民社會的發展有所助益，這關係著虛擬與實體間的互動，也關係著國家如何與其他多元行為者進行溝通，更關係著個人如何在全球化中尋找自身的定位。